

论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的策略

□ 杨 斌

内容提要:70 年代末以来,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而国家集中性财力严重不足;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年年下降,而总体上人民负担不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聚财上违背科学合理的原则,聚财渠道多元化,费大于税,财力分散。解决的对策,主要应着眼于规范财政分配制度,缩费扩税;进一步完善税制,加强税收征管,减少偷逃税,走内涵增收的聚财之道。

我国现阶段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摆脱财政困境,要走内涵增收的聚财之道。这是由现阶段我国财政分配的状况所决定的。

一、我国现阶段财政分配的总体状况

在和平时期,财政困难的原因大体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经济衰退型,即因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总供给和总需求均难以为继,导致财源枯竭。其二是分配秩序紊乱型,即因聚财上违背科学合理的聚财之道的基本要求,聚财渠道多元化,费大于税,财力分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财源茂盛。很显然,现阶段我国财政困难不属于第一种类型,而属于第二种类型。也就是说,我国当前财政困难是由于分配紊乱引起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而国家集中性财力严重不足;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年年下降,而总体上人民负担不轻。以下重点研究后一个特征。

(一)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连续下降

70 年代末以来,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 年这一比重还高达 28.4%,到了 1995 年降低到 10.7%,近两年虽采取部分预算外资金转为预算内管理,这一比重仍回升乏力(见表 1、图 1、图 2)。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在这 20 年中,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的年份达 15 年,其中弹性系数低于 0.5 的年份将近一半。从图 2 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曲线与 GDP 增长速度曲线重合或前者超越后者的线段比较短,而多数年份前者均落于后者,可见在经济财富的增加量中由政府通过预算内正常渠道集中的部分相对下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国家集中性财力占 GDP 的比重略有下降,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出现年年下降的局面,使这一比重降到过低的程度,则会出现许多弊害,这导致了政府宏观控制能力的减弱,预算内财政成为“吃饭财政”,满足一般公共需要的财力严重不足。作为一般的公共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部门长期处于“瓶颈”状态。这一方面使经济难以均衡发展,周期波动比较明显。从图 2 可以看到,这 20 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三

大周期,经历了三个波峰和三个低谷,财政收入的增长变化和物价波动的态势与此基本相同,也经历了三个波峰和三个低谷,目前正处于第三个低谷。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或有关部门,为了消除“瓶颈”,促进经济增长,纷纷出台政策,以给政策代替出资拨款,通过税外收费集资建设基础设施,一地经验各地仿效。使得税外收费被当作预算内拨款不足单位的补充财力,推而广之成为有权部门“创收”的重要形式。至此,税外收费终于泛滥成灾,其结果反过来又使税基扩展缓慢,预算内财力更加紧张。“正税”不重、“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成为当前我国财政分配的一大特点。

(二) 税外收费规模庞大,占 GDP 比重连续上升,总体财政负担沉重

目前,我国的“正税”负担不重,列入预算内的各项税收总额占 GDP 的比重处于低水平且呈连续下降趋势。由于进行了 1984 年和 1994 年的税制改革,统计年鉴中各个时期税收收入总额的数据不可比,笔者根据税利分流原则^①对此进行调整使之可比。按调整后同一口径计算,1987 年到 1996 年的 10 年间,税收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重,1987 年最高为 15.89%,1988 年为 14.76%,1989 年为 14.63%,1990 年为 13.19%,以后年度徘徊在 11%—12%之间,1996 年为最低,只有 10.07%。由于目前预算内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因此这一比重与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变化情况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占用的社会财富的比重降低。因为,在预算内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总额占 GDP 比重下降的同时,政府税外收费的规模却日益增大,其占 GDP 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根据计算^②(见表 2),1988 年至 1996 年政府税外收费总额年平均递增 23.21%。不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政府税外收费总额占 GDP 的比重,1988 年—1990 年各年平均约为 9%,相当于当年预算内财政收入的一半略多。从 1993 年开始,预算外政府收费的总额超过预算内财政收入,出现“费大于税”的情况。虽然,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连续下降,但由于预算外政府税外收费猛增,使政府全部实际收入即由政府支配使用的社会财富很稳定

地占 GDP 的 24%—27%之间,多数年份为 25%左右。这说明在目前政治体制和政府要承担的职能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一般公共需要存在一个客观的量,其与 GDP 增长是同步的,一旦通过“正税”无法充足地提供财力支持,必然会产生政府机关税外收费问题。根据笔者的分析,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总量一般相当于 GDP 的 31%—33%之间,这是宏观税收(包括预算外政府机关税外收费)负担的最高界限,一般情况下这个界限不能突破,否则就会破坏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宏观税收负担率即税收收入总额(包括政府机关税外收费)占 GDP 的比率为 19%左右较为理想^③,因此,目前我国包括政府机关税外收费在内的实际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是不低的。可见,要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摆脱财政困境,首先要着力于整顿政府机关的税外收费,恢复正常、公开、法制的财政分配秩序。

二、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的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总体财政所受负担已是相当沉重了。因此,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解决国家集中性财力匮乏的问题,采用提高税率增加负担的办法是不可行甚至是危险的。应采取内涵提高的策略,就是在不增加总体财政负担甚至还有所降低的前提下,

① 参见杨斌《论宏观税收负担数量界限》(《财贸经济》1992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杨斌、胡学勤《政府税外收费的实证分析》(《福建税务》1998 年)。

③ 参见杨斌《宏观税收负担总水平的现状分析及策略选择》(《经济研究》1998 年第 8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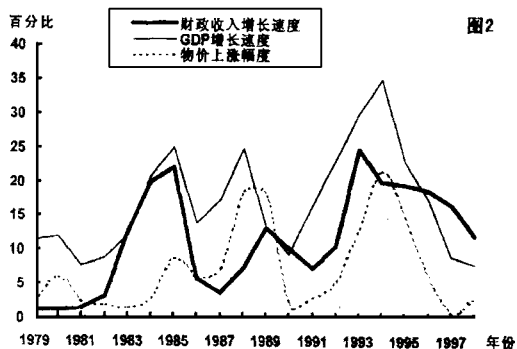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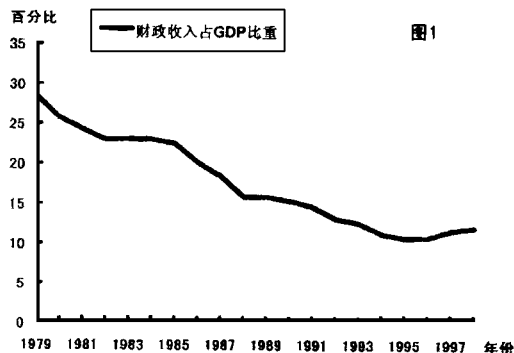
表 1:

项目 年份	GDP (亿元)	财政收入 (亿元)	财政收入 占 GDP 比重%	财政收入 增长速度 %	GDP 增长 速度%	弹性 系数
1979	4 038. 00	1 146. 38	28. 4	1. 2	11. 4	0. 11
1980	4 517. 80	1 159. 93	25. 7	1. 2	11. 9	0. 10
1981	4 862. 00	1 175. 79	24. 2	1. 4	7. 6	0. 18
1982	5 295. 00	1 212. 33	22. 9	3. 1	8. 9	0. 35
1983	5 935. 00	1 366. 95	23. 0	12. 8	12. 2	1. 05
1984	7 171. 00	1 642. 86	22. 9	20. 2	20. 8	0. 97
1985	8 964. 40	2 004. 82	22. 4	22. 0	25. 0	0. 88
1986	10 201. 20	2 122. 01	20. 1	5. 8	13. 8	0. 42
1987	11 962. 50	2 199. 35	18. 4	3. 6	17. 3	0. 21
1988	14 928. 30	2 357. 24	15. 8	7. 2	24. 8	0. 29
1989	16 909. 20	2 664. 00	15. 8	13. 1	13. 3	0. 98
1990	18 547. 90	2 837. 90	15. 3	10. 2	9. 7	1. 05
1991	21 617. 80	3 149. 48	14. 6	7. 2	16. 6	0. 43
1992	26 638. 10	3 483. 37	13. 1	10. 6	23. 2	0. 45
1993	34 634. 40	4 348. 95	12. 6	24. 8	30. 0	0. 83
1994	46 759. 40	5 218. 10	11. 2	20. 0	35. 0	0. 57
1995	58 478. 10	6 242. 20	10. 7	19. 6	25. 1	0. 78
1996	68 593. 80	7 407. 99	10. 8	18. 7	17. 3	1. 08
1997	74 772. 00	8 642. 00	11. 6	16. 7	9. 0	1. 86
1998	80 753. 76	9 683. 68	12. 0	12. 1	8. 0	1. 51

资料来源: (1)《中国统计年鉴 1995》、《中国统计年鉴 1997》。

(2) 1997 年数据为预计数。

(3) 1998 年数据为计划数或预算数。



通过政府全部收入形式结构的调整及对偷逃税等财力流失的有效控制,使规范性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让不规范的预算外政府机关税外收费的比重大幅下降。主要应着眼于规范财政分配制度,缩费扩税;进一步完善税制,加强税收征管,减少偷逃税,走内涵增收的聚财之道。

(一) 缩费扩税, 规范财政分配制度

要对税外收费进行全面清理,首先要区分以商品、服务、资源、资金等所有权或占有权为依托的收费与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政府收费。前者具有价格或租金、利息性质,广义上均属于价格范畴,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规范,在此不做详细阐述。其次对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政府收费,要区分合理的政府收费、名费实税的“政府收费”和不合理的政府收费(包括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进而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合理的政府收费范围,这就需要探讨政府收费的性质和设费原则。

就政府收费的性质而言,政府收费具有如下基本特性: (1) 相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收费是对特定管理对象的特定行为征收,一旦该对象或行为消失或剧增,收费收入也会消失或剧增。例如惩罚性收费中的排污费收入,要根据该地区的污染状况收取,具有不确定性;而在该地区企业治污效果显著的情况下,排污费收入可能剧减,表现出不稳定性。现代社会中的税收源泉包括所得、收入、财产和流转额等,尽管它们也会随着经济的波动而稍

表 2:

项 目 年 份	政府机关税外收费 (亿元)		财政收入 占GDP 比重%	政府预算外 税外收费占 GDP比重%	政府全部实 际收入占 GDP比重%
	总额	其中预算外 ^①			
1987	1 176. 22	1 033. 18	18. 4	8. 6	27. 0
1988	1 495. 76	1 319. 58	15. 8	8. 8	24. 6
1989	1 595. 35	1 415. 94	15. 8	8. 4	24. 2
1990	1 907. 64	1 608. 11	15. 3	8. 7	24. 0
1991	2 496. 68	2 256. 58	14. 6	10. 5	25. 1
1992	3 428. 35	3 163. 20	13. 1	11. 9	25. 0
1993	4 764. 94	4 563. 90	12. 6	13. 2	25. 8
1994	7 059. 78	6 779. 60	11. 2	14. 5	25. 7
1995	8 112. 71	7 716. 52	10. 7	13. 2	23. 9
1996	9 798. 46	9 073. 80	10. 8	13. 2	24. 0

资料来源:根据 1998 年—1997 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作变动,但除非社会或经济发生剧烈动荡,是相对稳定的和可以预期的。(2)直接对应性,包括直接校正性或直接受益性。政府对违反法律法规或造成负外部效应的当事人进行处罚而征收的罚款或收费,具有直接对应性。而在政府管理性收费场合,缴费人可以亲自感受到政府机关在收费的同时所提供的管理性服务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具有直接对应性。例如各种鉴证许可收费,缴费者可以从公众确认某一信息或自己获得某一生产经营资格中获得显性收益;又如商标注册费,申请者可以从审批者批准并保护该商标使用的活动中获得隐性收益。因此,在可以确定政府某项活动的受益者情况下,政府机关向被管理者收取适当的费用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但要注意防止行政机关以收费为目的开展某些不必要的管理活动,如通过发放不必要的证照收取高额工本费等行为。

由上述政府收费的两项特性所决定,在确定政府收费的项目和标准上,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比较效率原则。一般来说,不以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政府收费只有在对比税收更有效率的情况下才应存在。特别是在收费和收税两种方式均可采用的场合,要通过效率比较来确定收费还是收税。如果收费的直接成本低而且对市场的负面影响比税收形式来得小,可采用收费形式。否则必须采用税收形式,因为依法征收的税收即规范的税收更易于达到公平和效率的

统一。

第二,比较公平原则。如果说被管理者由于受益或受惩罚而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符合公平原则,那么由其支付政府开支所需的全部费用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政府的良好运作会给包括未直接接受管理者在内的全体人民带来福利,而国家提供的某些纯公共产品如国防、治安和具有正外部效应的非纯公共产品如教育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受益的,通过政府收费由少数人负担这些属于一般公共需要的费用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应该限制政府收费的范围包括其项目和数额,防止征收的普遍化;还要控制其使用方向,不能将其用于提供纯公共产品或补贴非纯公共产品。相对而言,只有以流转额和所得额等为主要税基的税收才可以普遍征收,用于满足一般公共需要,因此,税收才是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经费来源。

第三,成本补偿原则。政府收费虽然具有直接对应性,但缴费人获得政府所提供的管理服务的受益大小或违法违规造成的损失大小很难估计,而且因人因事而异。另外,考虑到政府管理活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众利益,具有很高的正外部效应,因此,即使在可以定价收费的情况下,也应该确定较低的收费标准,一般应以进行该项管理活动的直接成本为上限。如果无法确定受益人或者政府某项活动的成本难以估计,就应当免费提供服务,以税款支付其经费,而不应收费。

要规范财政分配关系,首要的

①这里指不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所有政府机关税外收费,与通常所说的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概念不同。

任务是按照政府收费的性质和设费原则严格限制政府收费的范围,依法治费。首先,对属于这一范围的各项收费项目,要通过法制渠道进行规范。有关政府收费的任何问题,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决定。决定结果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法律要明确具体且相对稳定,也就是由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逐项公布条例,明确规定缴费人、缴费对象、费率、收费人、稽征办法、使用方向以及缴费人和收费人的权力和义务。收费项目的废立均需要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通过法律程序决定。任何人都不得在法外任意立项收费或改变法定收费标准,以防乱收费。其次,征收成本要最小化。对法律规定要征收的政府收费,尽量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或委托征收,防止为收费而设置机构、建立站卡,收费手续应简便易行、尽量方便缴费人。第三,建立有利于杜绝乱收费蔓延的管理机制。一方面,对政府收费采取收支两条线办法纳入预算管理,实行收支脱钩、专款专用,收入都要上交财政部门,支出由财政部门专项拨付,禁止比例上交或余额上交,避免收费数额与收费单位的利益相挂钩,从而从经济利益这一根本,消除收费单位擅自立项或提高收费标准的冲动,也阻止缴费人为少缴费而进行寻租活动。另一方面,建立新的政府职效考核办法,不仅要考核经济增长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情况,还要考核实现经济增长和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如果资金来源不合法、不规范,属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则即使经济增长和社会事业发展,也视为不合格。因为,靠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短期的、眼前的、局部的,是以牺牲长远和全局发展甚至是牺牲国家长治久安为代价的,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不能鼓励,而且应当制止。第四,要致力于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冗员,对不需要设置的机构或可有可无的机构要下决心取消;对已有机构要转变职能,尽量精简;对需要设置的机构和需要办的事情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通过财政正常渠道拨足经费,避免机构设置过多、人员过多——财政拨付的经费不足——靠单位收费——税基缩减——预算内财政困难——正常渠道经费不足——乱收费这样的恶性循环。这是消除乱收费、理顺财政分配关系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凡不属于上述合理的政府收费范围内的一切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税外收费,由全国人大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并入正税或单独设立税种或取消。这是当前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现实可行之路,当然也是艰难之路。可先在易于推行且能增加大额财政收入的领域进行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如在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仅靠排污费看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可考虑先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一方面对工业排污定量征收,另一方面对非工业用途的石油、煤炭等产品定额征收。如对非工业用途的石油产品按每升1元征税,就能产生相当于GDP的1.1%的财政收入增加量^①,这既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保护环境,又不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缩费扩税改革,不仅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再调整,而且将涉及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许多阴暗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势力的抵制。但唯有如此,财政分配秩序混乱局面才能得以扭转;唯有如此,国家长治久安才能得以维护;也唯有如此,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才有前提。

(二)进一步完善税制,健全税收征管,控制偷逃税,减少税源流失

这是实现内涵增收聚财策略的第二个着眼点。目前,我国纳税人偷逃税现象相当严重,偷逃税面广量大,法外设置税收优惠政策或执法中随意减免税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其结果,使法定的税率与实际的税率差距很大。先以主体税种增值税

^①世界银行《中国经济:治理通胀、深化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6页)。

为例, 1995 年, 我国 GDP 为 58478.10 亿元, 其中第二产业为 28538 亿元, 即使对第一产业应征的增值税和对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应征的增值税忽略不计, 仅对第二产业按法定税率征税, 应征数就达到 4851 亿元, 而实际征收到的增值税总额 (包括所有三大产业) 只有 2602 亿元。因此, 保守估计征收率^①不到 60%。增值税征收率每提高 1%, 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将增加 0.067%^②。因此, 如果增值税征收率能提高 15%, 就能在法定税率不变的条件下, 使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提高 1%。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率也很低, 不足 50%。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职工住房、医疗等社会化改革逐步到位, 个人所得税增收潜力很大, 是实现内涵增收的依靠税种之一。有必要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状况出发, 重新认识和定位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作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状况是: 人均收入水平逐年有所提高, 但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③。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使我国个人所得税以财政收入为目标, 实行低税率、广税基的普遍征收具有可能性; 而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日益严重, 使个人所得税必须以公平为主要目标。合理兼顾这两个目标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方向, 一方面, 个人所得税应主要以占总人口 5%—10% 的最高收入阶层为征收对象, 强化征管, 辅以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手段, 全面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公的调节力度; 另一方面, 对各类所得 (包括工资薪金、各类独立个人劳务所得、投资所得、财产所得、已实现资本利得等), 征收 5% 的最低限度税, 实行源泉扣缴、免填申报表的办法, 减少征收成本。通过此项改革, 可望使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占到 GDP 的 1% 以上, 使之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最主要的辅助税种。要做到这一点, 控制偷逃税、提高征收率是前提。

要控制偷逃税,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

和税制结构特点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极不平衡, 处于多元的发展格局, 少数发达的城市和极少数乡村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多数地方还相当落后, 大多数农村仍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 甚至处于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绝对贫困状态。因此, 我国税收征管模式不应当是单一, 而只能是多元的, 只有如此才可能行之有效。

对发达城市, 可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 实行以计算机网络和中介服务机构为依托、纳税人自行申报、税务机关重点稽查为特点的征管模式。但在改革过程中, 一方面, 要充分注意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 都只能推行以流转税为第一主体税种和企业所得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情况。这意味着纳税人主要是企业, 而企业的户数尤其大户的数量毕竟有限, 采取管理到户的办法, 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是有效率的办法; 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的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不可能采用管税到户的办法, 而只能采取纳税人自动申报、税务机关重点稽查的办法。现西方国家在企业或个体经营者的税收征管上也有指定专人管理若干个企业或一个地段企业的情况。借鉴西方的经验要切忌

① 征收率是指某一个税种一定时期实际征收入库的税额与按法定税率计算的应征税额的比率, 用以测定税法的执行程度。

②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 治理通胀、深化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第 54 页)。

③ 据世界银行统计, 1995 年, 我国占总人口 20% 的较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额占总消费额的比例达 47.5%, 其中占总人口 10% 的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额占总消费额的比例则高达 30.9%; 而占总人口 20% 的较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额只占总消费额的 5.5%, 而其中占总人口 10% 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额只占总消费额的 2.2%。改革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1995 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 0.445, 比 1988 年的基尼系数高出 7 个百分点, 年均上升一个百分点 (见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第 222 页)。

与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

□ 邓力平
詹凌蔚

表面化、片面化和“提纯”现象。另一方面,更要力戒不顾国情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劳动力是第一丰富的资源,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能采用劳动密集型且成本较低方式解决的事情,就应当避免采用技术密集型方式。

对相对落后的城市、乡镇和广大农村,在征管改革上应着眼于总结过去几十年我国自己发展起来的传统征管模式和征管办法,如管理到户制度、源泉课税制度、批发扣税制度、设站检查制度、发票管理制度、群众护税协税制度、民主评议和举报制度、定额定率征收制度、与当地有关部门和异地税务机关相互配合综合治理制度等。这些办法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陷,但适合我国国情,是第一线税务干部工作实践的总结。在新时期征管改革的实践中,要本着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态度,吸收其合理内核,再结合新时期的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国外国内经验,本着节约、量力而行和讲究实效的原则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征管查分工协作、互相制约、共同促进的征管体系,并通过法制进行规范。

有了好的税收制度和征管制度并不意味着在控制偷逃税上就万事大吉了。在我国,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的现象仍十分普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为人情所左右的问题仍大量存在。偷逃税之所以屡禁不止的原因正在于此。相当多的纳税人抱着偷逃税不会被查处的侥幸心理,还有一部分纳税人通过事先与有关权力部门建立稳定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或关系网,成为不被稽查的特权户,可以有恃无恐,大肆偷逃税。一旦这种现象蔓延到了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程度,纳税人对偷逃税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就会显得比较低甚至被认为无成本,偷逃税遍地开花就在所难免。因此,强化稽查选案的客观性、公开性,避免随意性,实现严格公正执法,逐步杜绝人情税,从而提高偷逃税被查处的预期成本,是控制偷逃税的关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

(责任编辑:崔光营)

内容提要:“知识经济”一词,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书籍等媒体上。知识经济是什么,它的内涵有哪些,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它的出现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邓力平教授和他的学生詹凌蔚撰写了这篇文章,对对知识经济的基本认识、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及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希望能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和启发。

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的浪潮将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必然对包括各国税收制